

# 「六四悲劇」的政治經濟學

• 郭益耀

2009年10月，筆者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上撰文，回顧新中國建國六十年來的大是大非<sup>①</sup>。然而，除了上文所討論過的大躍進和「文革浩劫」外，無論如何也無法迴避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的那場轟動全世界的風暴。因此，本文是那篇文章的續篇。

香港和國外許多人，不論是專家學者，或普通觀察家和老百姓，對當前中國大陸經濟的騰飛，除表示驚訝、稱許，甚至羨慕之外，一般都不免對其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方面的表現有諸多異議。尤其是執著於自由、民主、人權的黨派或個人，在看到國力增強、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遽然崛起，欣喜或無奈之餘，巴不得北京政權立刻全面開放，全面實行民主普選、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等等；以期與西方高度民主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或日本看齊，則皆大歡喜也。

有這種自由民主政治主張或強烈傾向的黨派和個人（以下姑且統稱之為「自由民主派」），當然也恨不得將那位把中國帶向西方的、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鄧小平劈成左右兩半，將其造成「六四悲劇」的那一半丟進大海。問題是，鄧小平可「一分為二」嗎？至於毛澤東，對自由民主派而言，則是千古暴君，長期陷無辜的中國人民於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水深火熱之中；尤其是大躍進與文革十年，更是五千年歷史中匪夷所思的萬劫沉淪年代。

誠然，當代中國的歷史經驗似乎說明了，經濟與政治密不可分。就連最「實事求是」、在文革時被紅衛兵或毛派重重包圍、雷霆萬鈞地批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折衷派」的鄧小平，在1989年的那場風暴中也充分體現他不想、或不可能以經濟政策／經濟制度對天安門廣場上許多學生及知識份子以「自由女神」為代表的政治訴求作出妥協。這其中的關係看來似甚奧妙，其實其基礎理性 (raison d'être) 與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互為表裏的內在統一理性，是相去不遠的。本文就中國這六十年來制度變遷的經驗，分幾個重要的層面談談其中的道

具有自由民主政治主張或強烈傾向的黨派和個人恨不得將那位把中國帶向西方的、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鄧小平劈成左右兩半，將其造成「六四悲劇」的那一半丟進大海。

理。筆者本身並非研究政治學或社會學的，主要是從經濟學角度看問題，所以政治、社會方面的問題大體上也只能點到為止，或表而不提。

## 一 中央計劃與政治專制形影相隨

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始於1953年，當年也就是中央計劃實行的第一年。姑不論中央計劃的經濟理性何在，從富國強兵的長期目標而言，這一制度是否會比西方經濟史上透過市場制度一步一步走上來的辦法優越；也不論中央計劃制度本身所內涵的超經驗價值體系以及其目標是否「應該」、或可不可以接受；也不管當年這是否代表沒有辦法的辦法，非接受蘇聯老大哥的那一套不可，但是中央計劃作為一種資源調撥制度，其有效的執行則非透過政治集權（或曰專制式的政治體制）不可。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可簡要說明如下。

### （一）黨政如何介入經濟

首先，在中央計劃實行的1953年，1月即強制實行糧棉產品的「統購統銷」，非如此則何以保證城市工人的糧食需求，以及輕工業所需的原料投入？接着便是逐步的農村集體化，非如此則何以更有效地執行統購統銷政策？同時，與農村集體化並行的是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或曰國有化），非如此則何以制止工商企業不依中央計劃，而為市場需求而生產？再者，工農業產品的價格也非依計劃逐步凍結或官定不可，否則何以保證國家有足夠的財力執行中央計劃以及進行有效的計劃核算？這些都是自明之理，對不少學者專家、尤其是對「比較經濟學」稍有認識的學生而言，都是老生常談。然而，這一經濟體制顯然在政治上也需要完整的配套工程，這就是建國六十年來大家所熟悉的黨政兩大系統並行、由上而下、垂直貫穿每一行政階梯的經濟計劃與生產監控制度。這一龐大的官僚體系表現在環環緊密相扣的工業部門，當然滴水不漏。但在農村，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後，似乎也是無遠弗及；讓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其次，中央計劃當然主要是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而設的。姑不論這一套由斯大林首創的、為「加速工業化及國防科技建設」而設計的建國方略是否比西方先進國家過去兩百年來由輕工業而重工業的歷史發展軌迹優越；但是，這一種「為重工業而重工業」、不斷地在資源短缺的牽制下「製造煉鋼煉鐵的機械」，而盡量避免生產紡織機器和食品加工所需的機械的做法（筆者在前述文章中稱之為「埃克斯坦模式」[Eckstein model]）<sup>②</sup>，卻清楚表明全國農民與工人的收入和消費必然長期遭遇到無以比擬的壓制。毛時代所不同的是，就如美國專家、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羅斯奇（Thomas G. Rawski）教授的研究專著所指出的，雖然毛時代人均收入（不可與人均GDP相混淆）沒甚麼太大的變化，但家庭收入確實是增加了，因為婦女們都被解放出來參與勞動，而有自己的收入了<sup>③</sup>。很顯然，這一做法，除了以一定的政治配套工程為前提外，也需要長時

姑不論中央計劃的經濟理性何在，從富國強兵的長期目標而言，該制度會否比西方經濟史上透過市場制度一步一步走上來的辦法優越，但作為一種資源調撥制度，其有效的執行非透過政治集權或專制式的政治體制不可。

間的政治掛帥或道德游說，以替代「物質誘因」；如「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等口號是也。

## (二)「努克斯式動員」的政治條件

再其次，「埃克斯坦模式」的另一個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側面是大規模的勞力動員，也就是筆者在前述文章中所說的、特別切入中國國情的「努克斯勞力積累」(Nurksian labour accumulation)④；也即是在缺乏資金與機械設備的條件下，透過動員過剩的勞力創建農村所需的灌溉與排澇等水利工程。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河南省號稱「世界第八奇蹟」的紅旗渠。這類大規模的勞力動員始於農村集體化之初，在大躍進與文革期間登峰造極；搞「政社合一」以加強動員的能量和監控的效率，也是盡人皆知的事。人民公社設公社食堂，免得家家戶戶開灶，既省錢又易於動員，共赴工地；為鼓勵士氣，也即有當年「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等響徹雲霄的口號。再者，搞成彌天笑話的土高爐煉鐵煉鋼也緣起於大躍進當年(1958)年初南寧工作會議決定發起全國各地進行農業工具(機械化或半機械化)改革，因此才有各家各戶爭先恐後奉獻飯鍋門鎖，丟入煉爐，「共襄盛舉」。記得當年國外有不少社會學家，還真以為毛喪心病狂，圍於「一大二公」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想徹底破壞中國幾千年來的家庭制度。這顯然又是隔岸觀火，慶幸自己溫暖的家庭無損所做出的想像。

毛發動政治掛帥，排斥國企的「利潤指標」、「獎金刺激」以至於農村最基本的「工分制度」，與改革開放後針對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導向改革，看來似乎恰有異曲同工之妙。

## (三)毛式的反官僚主義

最後，也簡單談談官僚主義問題和毛式的反官僚主義。毛的反官僚主義立場是廣為人知的。大躍進時幾乎將所有的大中型中央工業企業下放給各省管理，文革時又大力批判劉少奇在1960年代初期大搞「工業王國」，即各個工業產業部門各自為政，搞「獨立王國」，將下放了的地方國企重新收歸中央管理。這一「條條」(即中央產業部長垂直領導)與「塊塊」(即各個國企分別劃歸所在地的省政府或下屬行政階層管理)之爭，各有其專業性的優劣之處，這是對前蘇式經濟制度稍有研究的人都耳熟能詳的事。然而，毛強烈的反官僚主義的理念與傾向，卻不幸地在大躍進期間連國家統計局的權限也大幅度下放給地方政府，結果搞出了致命的浮誇風、瞞產風；這不但使當年整個國家統計制度全面崩潰⑤，連本來還行之有效的中央計劃也一時蕩然無存。這一悲劇插曲，肯定是讓人忘不了毛的。

文革與大躍進在反官僚主義方面一脈相承，但除了中央工業企業再度下放，並配合「備戰備荒」搞地方各自為政之外，毛為了擺脫「條條」與「塊塊」建制的專業型控制(或曰官僚枷鎖)，也更為全面性地、系統化地針對個別工農業生產單位，再次發動政治掛帥，排斥國企的「利潤指標」、「獎金刺激」以至於農村最基本的「工分制度」。這與改革開放後針對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導向改革，即基本上以市場調控取代「條條」與「塊塊」的直接控制方式，看來似乎恰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毛的《廣陵散》於今絕矣，其革命浪漫主義的理想與壯志，就如

曲中氣吞山河的聶政義憤，肯定是完全不能見容於今日慢慢摸索出來的、講專業、講法治、漸趨健全的現代化建制之中的。

## 二 「六四悲劇」的政治與經濟問題

中國國土廣大，中央計劃制度的建立，顯然需要前述的「條條」與「塊塊」相輔相成，否則難以覆蓋全國的資源稟賦。中國如此，前蘇聯也如此，其他東歐小國當然未必盡然。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龐大的經濟行政或官僚系統，必然需要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權以維持其整體性及運作效能。任何對政治多元化的訴求，都有可能導致此一斯大林式的經濟制度結構及其所蘊含的經濟發展策略的解體，不管論者對此一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權理念不相協調的策略性建制持甚麼態度。「六四悲劇」本質上應可簡單地概括為緣起於對政治多元化 (pluralism) 的訴求與此一經濟方面的「策略性制度結構」的特異性 (singularity) 之間的矛盾。

1989年天安門風起雲湧之際，筆者適逢身處澳洲悉尼市，應聘出掌馬夸理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 的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還不到一年；校方當時已經安排好8月28日舉行講座教授就職演講典禮。因為研究所是澳洲政府外交與通商部全資贊助成立的，所以講題也已經訂好是有關中國對外經貿政策的幾大問題。「六四風暴」爆發後，研究所董事局主席肯乃第 (Trevor Kennedy，當時澳洲首富、聯合報業集團 [The Consolidated Press] 的大亨帕克 [Kerry Packer] 的左右手) 眼見全世界嘩然，當即要求筆者改變講題，並說，「無論如何，您得將脖子豁出去」 (stick your neck out)。筆者也當即應允，毫不猶豫地給了道新題目，即「中國往何處去？」 (Where Will China Go from Here?)。講稿也隨後發表於當年9月份的《澳大利亞季刊》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2008年9月也收錄於筆者的一本新論文集<sup>⑥</sup>。此處不另贅述，僅談談幾個重要結論。

1989年夏天鐵漢扼腕斷臂，造成那場憫天大悲劇，也可說是緣起於那龐大的、積重難返的中央計劃與政治集權合二為一的特異性結構的內在理性。簡而言之，這一「內在的結構理性」顯然必須以強制性的政治穩定為前提。

### (一) 維持「策略性制度結構」穩定的政治前提

首先，面對當年西方各國都以為北京政權就將分崩離析、改朝換代的看法，筆者斷言，共產黨領導將絲毫無損；並責問論者，戰後西方各國有哪幾位執政者的在位年期比蘇聯 (1991年才告解體，後改稱俄羅斯或獨聯體) 或中國的領導人更長。誠然，西方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各先進國家，經一兩百年的發展以及不斷地調整，其基本上以「消費者主權」 (consumer sovereignty) 為基礎的經濟，早已形成了輕工業與重工業互為切入、平衡協調發展的機制。在這一種早已定型並固若金湯的現代建制上，民選政府換人，司空見慣；一般性的改朝換代所引發的政策變化，也大都屬於邊際性的調整，不會觸及制度的根基。

反而觀之，社會主義國家，就如1980年代末期的中國大陸，其基本經濟結構實際上仍然偏重於重工業。尤其在「埃克斯坦模式」的導向之下，重工業仍然很明顯地繼續保持與輕工業的「斷層關係」。正因為如此，「六四」當年的中國經濟仍然擺脫不了知名匈牙利經濟學大師科奈爾 (János Kornai) 所指的短缺型

經濟 (Economics of shortage) 的制約<sup>⑦</sup>。因此，由1984年10月號稱「第二次三中全會」<sup>⑧</sup>所決定的長期經濟改革藍圖中所延伸出來的「雙軌制」(即為計劃指標與市場需要並行生產的新機制)，也才試行了三幾年，便已經引發了天安門廣場上眾多學生群起而攻之的「官倒爺」的猖獗套利活動(即借用官職將計劃物資倒賣於市場，以賺取暴利)。同理，也就只是「六四風暴」前一年的夏天，鄧小平因受某幾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的誤導，斷然全面放開物價，便立刻導致物價飆升、銀行擠提、市場搶購的大亂局面<sup>⑨</sup>。

由此觀之，1989年夏天鐵漢扼腕斷臂，造成那場憫天大悲劇，也可說是緣起於那龐大的、積重難返的中央計劃與政治集權合二為一的特異性結構的內在理性。簡而言之，這一「內在的結構理性」顯然必須以強制性的政治穩定為前提；因此，戰後奉行蘇式經濟的國家政權都長期保持相對的穩定；因為當政者誰都不敢承當這一巨大的特異結構如因政治上遽然自由化而崩潰所可能造成的滔天經濟後果。實際上鄧小平那整套漸進式、「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其本身也可說是這一「結構理性」所使然的。

自2008年初秋金融海嘯爆發以來，日日見報，美國及歐洲各國政府對大型金融工商企業都有「其大無以復加，不容崩潰」(Too big to fall)之說。而區區一個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破產，已經觸發全球雞犬不寧。所以當年中國那龐大特異性的經濟體系如果遽然解體的話，豈不令國人更嗚呼哀哉。蘇聯在1991年瓦解後，經濟連年負增長，民不聊生，直到近年才慢慢恢復元氣，便是很好的教訓。

## (二) 悲劇是「政治改革滯後」的結果嗎？

其次，「六四悲劇」是「政治改革滯後」的結果嗎？筆者當年在悉尼市的就職講詞中，也提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很可能即將面臨危機，沒想到那也是「不幸言中」。大家還記得，「六四」前後，西方各界都一致稱許戈爾巴喬夫「政治先行」的改革方案(俄文曰Perestroika、Glasnost)；而目睹天安門廣場的情景，也都說這是經濟改革先行、政改滯後的必然結果。當時也正值西伯利亞以及烏克蘭的煤礦工人風起雲湧，輪番罷工；莫斯科被迫以火車專列趕運一箱箱的衣服和肥皂等日常用品前往平憤。筆者面對着幾百位聽眾直說，假如波羅的海那三個蕞爾小國要求獨立或自治也同時得逞，而大家都遁往這些新天地的話，那戈爾巴喬夫將何以招架？

也僅僅在兩年之後，不但戈氏本人因蘇聯各成員共和國(約相等於中國的「塊塊」)相繼效法波羅的海各國擺脫莫斯科的控制而被迫下台，就連整個國力一直足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強國也全面崩潰了。有位法律界的好朋友曾對筆者說，今日俄羅斯人的生活，肯定比蘇聯時代好得多。這是實話。但是，姑不論斯大林初期傾全國資源搞工業化建設對後來蘇聯經濟的發展有何創業型的貢獻(這一點最少俄羅斯現任總理普京[Vladimir Putin]的看法還是肯定的)，假如當年不是戈爾巴喬夫或不是緊跟其後而冒險性更強的、貿然搞「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葉利欽 (Boris N. Yeltsin)，而是「漸進式」的鄧小平在蘇聯當家的話，

鄧小平穩住政局後，以他的胸襟與魄力、實事求是的風格，既推倒「兩個凡是」而又要求全國好好地、整體地去理解「毛澤東思想」，是不可能會放棄其「韜光養晦」、借用外資、引進高新技術的長期國策導向的。

恐怕俄人今日的生活還會是更好的呢。而且在國防問題方面，也不必至今日仍處處受美國這唯一的世界霸權所牽制。可悲，孰不可悲！

其三，「六四悲劇」爆發時，西方各界也幾乎即時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畫上句號。然而，筆者當年在悉尼市的講壇上，也斷言中國會繼續進行經濟改革，雖然難免會有些「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反反覆覆；筆者也斷言，中國對外的大門也會繼續敞開，而且幅度還會更大。這一信念的背景很簡單：鄧小平穩住政局後，以他的胸襟與魄力、實事求是的風格，既推倒「兩個凡是」而又要求全國好好地、整體地去理解「毛澤東思想」，是不可能會放棄其「韜光養晦」、借用外資、引進高新技術的長期國策導向的。

事實上，緊隨着「六四悲劇」之後，1989年底、1990年初蘇式傳統對國企的官僚式實物管理與控制辦法也果然回潮了，但是在杜絕官倒、避免通脹升溫以後，很快地，1992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即展開其有名的南巡並發表講話，為當年10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正面地以及全面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定了調，並讓中央以及省市各級政府全力「以（廣大的國內）市場交換（外國的先進）技術」、競相吸引外資。這終於使中國從此走上了納入世界自由經濟體系的不歸路；這也都已經成為歷史了。

### 三 改革開放與自由民主的不歸路

1988年的春天，筆者當時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正在趕着為年中赴澳洲出任講座教授前完成一項專題研究。研究助理是一位國內暫時滯留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父親是遐邇知名、德高望重、身居國家要職的經濟學家）；外國已經有某大學研究院錄取她，並提供獎學金。她甚想在出國前趕赴北京向父母親辭別，又深恐辦理出國的審批手續發生變數，談起來聲淚俱下。其實這是當年司空見慣的煩惱與悲情。她如今已是一位成功的投資與金融業專家，最近看了筆者〈中國真比不上四小龍嗎？大陸的發展經驗與「比較利益」原則〉一文後<sup>⑩</sup>，仍然心有餘悸地說，「我完全同意郭老師對中央計劃內在理性的分析，也同意中央計劃對富國強兵、追趕先進國家方面所作的貢獻，不過我就是不敢想像生活在中央計劃經濟之中」。筆者一時不知何以對，只說現在不是基本上已經來去自由了嗎？但也同時想起了鄧小平1980年代初期所說的那句話，即「送出去一百個〔留學生〕，有二十個回來〔參加國家建設〕也就夠了」。目前看起來，尤其在美歐爆發金融海嘯之後，見中國枝獨秀，「海歸」之族，恐怕已經超過了20%吧。

胡錦濤與溫家寶掌權以來，不斷地強調創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曾幾何時，也就是十五或還不到二十年前吧，中國在面對西方世界有關「人權」的指責時，還必須不時以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作自我解脫。近年則更進而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是普世（或曰普遍）價值。然而，今日還有某香港知名社會學家說中國正在進行的「消費革命」將會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姑不論這是否在為溫家寶2006年在赫爾辛基召開的歐亞峰會上的發言下註解；但談到「消費革命」，恐怕今日香港人和台灣同胞最為清楚，爾今之後，將愈來愈仰賴中

對許多學者專家來講，中國大陸的「消費革命」就仿若「黃粱夢醒」，朦朧中殊不知滿桌黃粱套餐已可就食矣；當然更不敢想像這也是從毛時代開始，經幾代中國農民和工人，節衣節食，勤儉創業，貽子饋孫，所累積的陰德。

國大陸旅客的消費了。誠然，對許多學者專家來講，中國大陸的「消費革命」就仿若「黃粱夢醒」，朦朧中殊不知滿桌黃粱套餐已可就食矣；當然更不敢想像這也是從毛時代開始，經幾代中國農民和工人，節衣節食，勤儉創業，貽子饋孫，所累積的陰德。

## 四 結語

政治學者和社會學家對中國、尤其是毛時代的看法，一般都比較偏重於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問題，獨不考慮其背後所代表的是一個龐大的、政治與經濟合一的特異性制度結構。而這一特異性結構，其本身也就是那整套獨特的蘇式(或筆者所指的「埃克斯坦模式」、近乎「救亡」方式的經濟發展策略的體現。可別忘了，毛時代前有美國圍堵、禁運，後又另加中蘇交惡、背部受敵；哪來有機會，如一般論者侈言，打開門戶，以經濟學上的「比較利益」原則為依歸，如今日一樣地納入西方世界的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體系之中？且不說否定或贊成這一整套「策略性制度結構」也必然會將問題帶進了超經驗的價值領域(或曰倫理道德範疇)；但對這方面作任何討論，其結果也必然是「沒完沒了」的。所以最好還是「就事論事」地討論問題吧。

西方先進國家經過兩三百年努力才逐漸形成了今日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以西方建制的標準，簡單地去指責毛或毛時代中國不懂「現代文明秩序」為何物，這顯然又是無視當年所實行的那整套政治經濟統制合一的「特異性」或「策略性」的制度結構，其本身就不是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設的。所以這類論調豈非形同「套套邏輯」(tautology)呢！這一點倒令人不禁想起了當年金兵壓境，北宋士大夫紛紛南遷，如過江之鯽，不思國難當頭，何以禦敵，卻仍頻頻議論朝政是非。

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也都說明了，長期而言，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社會體制的調整，基本上也是經濟發展的因變數。過去三十年，中國在政治與社會諸多層面所發生的變化，顯然也是經濟發展、人民生活與消費水平不斷提高、中產階層人數不斷上升所帶動的。相信沒有人會否定，今日的中國到底也是比以前自由得多了、民主得多了；互聯網的廣泛傳播使用，也有力地加強了「民情上達」的渠道。然而，有人在肯定了這些正面變化之餘，一方面影射中國仍缺乏民主機制以疏導民情民怨，隨時都可能發生「政治地震」，另一方面又說政治現代化不一定要完全仿效西方做法。這類「從概念到概念」的闡釋，甚難知其所言為何物；顯然是對某種政治或政制願景的潛台詞。

其實除了「消費革命」和「互聯網革命」外，今日中國也完全暴露於國際輿論虎視眈眈的壓力之下。各級政府也必然會愈來愈主動地去了解民情民怨，以策萬全。應否完全仿效西方民選政府的做法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在各級以下的政府也已經在這方面展開實驗了；這顯然也是一種「漸進式」的嘗試。然而，要北京斷然全面自由化的話，恐怕中國領導核心也會如鄧小平當年一樣，面臨着全國穩定的政治與經濟格局可能遽然動搖或解體的難題與危機。雖然經過過去二十年的「市場導向」經濟改革，這方面的潛在危機可能不會如1989年時那麼嚴

長期而言，一個國家的政治與社會體制的調整，基本上也是經濟發展的因變數。過去三十年，中國在政治與社會諸多層面所發生的變化，顯然也是經濟發展、人民生活與消費水平不斷提高、中產階層人數不斷上升所帶動的。

峻，但目前看來，似乎犯不着為滿足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絕對價值」訴求，而去測試這可能造成的機會成本吧。這一切設想不禁令人想起文革時毛對「四人幫」要封殺某一電影片所批示的那句話；毛說：「此片無大錯，不可責備求全，這不利於文藝政策的調整。」把「文藝」兩個字換成「政制」也就得了。何必相煎太急！套句老話，歷史到底是「不以人們（包括北京）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就讓歷史自我調整、自求平衡吧。

更令人欣慰的是，隨着政治與社會層面的調整，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思想也都一一開始回潮了。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那百數十部講先秦諸子百家、歷代歷朝歷史人物文物等等的片集，受到大江南北廣大觀眾的歡迎，便是最好的寫照。2009年7月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逝世，黨國領導與國人皆視若重於泰山之崩，也是明鑒。記得香港新亞書院創校校長、國學泰斗錢穆教授1960/1961年應耶魯大學邀請前赴講學時，看到當年中國大陸的情景，感慨萬千地說了「共產黨的統治，不符合中國歷史的理與勢」這麼一句話（記得《新亞生活》當年也刊載了講詞）。相信錢老夫子現在應可無憂無慮，放心地安眠於無錫祖家了。

#### 註釋

①② 郭益耀：〈大躍進和「文革浩劫」夢魘何時了？——建國六十年經濟建設的反思〉，《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9年10月號，頁14-22（另載《新亞生活》，2009年10月號，頁20-25）。

③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人均GDP（即國內生產總值）包含消費財和資本財；人均收入（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前）基本上只包括足以維持所需消費的收入，因為儲蓄與投資都是集體或國企負責的。

④ 愛沙尼亞籍經濟學家努克斯(Ragnar Nurkse)一早認為經濟落後國家缺乏資金，可借用勞力動員，建設基礎措施，如灌溉工程；這等於是實質或有型資本（設備）的累積。參見郭益耀：〈大躍進和「文革浩劫」夢魘何時了？〉一文。

⑤ 詳見Choh-ming Li,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⑥ Y. Y. Kueh, "Where Will China Go from Here?",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61, no. 3 (1989): 358-69; Y. Y. 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chap. 3.

⑦ Já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ress, 1980).

⑧ 這是第十二屆的三中全會；因為所作出的有關經濟改革的「決定」，其重要性不下於1978年底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點」的決定，故被廣稱為「第二次三中全會」。

⑨ 參見郭益耀：〈香港人對「中國經濟變化」的一些看法：談談有關的成見、偏見、傲見、偏差、失誤〉，《新亞生活》，2008年11月號，頁22-25；郭益耀：〈不可忘記毛澤東：談談毛在改革開放和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作用〉，《信報財經月刊》，2008年12月號，頁40-48（另載《新亞生活》，2009年1月號，頁26-31）。

⑩ 參見郭益耀：〈中國真比不上四小龍嗎？大陸的發展經驗與「比較利益」原則〉，《新亞生活》，2009年5月號，頁18-22。

**郭益耀** 退休經濟學者，教授；現任香港（私立）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香港城市大學經濟與金融學系講座級客座教授。